

建設中，創建出一些新的制度性組織。為適應新的環境，他們將井岡山革命中心從寧岡轉到永新，革命堡壘從井岡山轉到九隴山。革命的重心從與掠奪型的客家土匪有持續的聯繫、容易防禦但孤立的高地，轉到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但更易受到攻擊的低地。同時，他們還重新探索黨和地方蘇維埃組織的公開程度的問題，並調整紅軍與根據地及紅軍與地方遊擊隊之間的關係。

作者的目標是對井岡山革命的微觀政治進行生動細緻的敘述。在資料上，他主要依賴的是地方黨史的研究成果。雖然作者在資料的搜集、甄別和運用上花了不少的力氣，這一點在該書的注腳中可以看到，但是作者最終很難克服這些資料本身所附帶的敘事結構。比如說，他常以「敵人」來稱謂民團和國民黨軍隊。作者不自覺地選擇了以共產黨的視角來敘述這段歷史。這種敘事角度的選擇本身無需辯駁，只是它與作者原初的社會史研究取向不太契合。這也許是受到資料來源的局限，因為作者所使用的資料大部份出自共產黨一方，但正是這種敘事角度的限制，作者無意對那些所謂的「敵人」，如民團，進行細緻的敘述。然而這些力量與共產黨力量並立，對井岡山的革命有着重要的影響。這些力量本身的發展脈絡以及內部構成如何，他們在這場激烈的革命運動中的選擇和境遇如何，在書中不甚明瞭。不過，這也許已經脫離了作者對本書結構的總體設計，只算是筆者對他的求全責備。

陳貴明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Merchants' Daughters: Women, Commer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 Edited by HELEN F. SI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xii, 375pp.

近世以來，華南地區經歷了一場急遽的商業化進程，在這個影響深遠的歷史變遷中，婦女的際遇也隨之浮沉，區域史與婦女史在此交織。為了關注這一話題，蕭鳳霞（Helen F. Siu）主編了論文集 *Merchants' Daughters: Women, Commer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以下簡稱《商人之女》）。該書梳理了華南地區自近世至當代的婦女、商業和區域文化三者的關係，並探討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中，婦女的處境、她們的身份認同，以及她們應對社會變遷的策略等問題。全書按照儒家文化、西方殖民因素，以及現

代的商業社會與女性的互動，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講述在儒家正統與華南固有傳統這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之下，女性的形象和實際處境等問題。華南地區長期存在着非儒家傳統的風俗，然而由儒士撰寫的中國歷史，卻容易讓人誤把撰寫者所構想的儒家社會視為歷史的實情。兩者相互交織，那些被認為是「異常」、「非正統」的風俗，最終得到主流的容許。在這個過程當中，女性也與男性一同參與了區域文化與形態的構建。這個觀點貫穿於本書第一部份的四篇文章之中。

劉志偉的〈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敘述了番禺大族何氏將一座女性墓地作為祖墓進行祭拜的故事。作者比對了「姑嫂墳」傳說的幾個版本，發現這兩位女性祖先的形象的變動。她們在儒學語境下被書寫為敦倫孝悌的媳婦和女兒，但這種見解卻稀見於民間記憶。「男尊女卑」並非華南地區所固有的觀念，而是在該地區融入「中國文化」的過程中被書寫出來的。

科大衛的〈母親的形象：華南地區婦女的身份地位〉，關注的是這一地區的士人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在士大夫為母親撰寫的傳記和私人書信之中存在着一種文學傳統，女性作為家庭生計的提供者、家庭事務或恆產的管理者，總是被置於家族的附屬和幫輔的地位上；兒子對母親的依戀和尊敬，也總是通過記述母親如何敦守婦德、辛勤操持家務等事體現出來。私人情感與三綱五常在文本中交織，它反映了儒家「正統」和當地的實際生活之間的差距，以及二者在話語上的相互妥協。

程美寶的〈「你有別的選擇嗎，六姑？」——粵謳所見的婦女和婚姻〉，發現了木魚書所反映的婦女的命運，與實際情況並不相同。木魚書是用夾雜着北方官話的粵方言記載的廣東地區的民歌集，其中含有大量的婚嫁歌謠，然而由於木魚書的編寫者是掌握文字的男性，木魚書所反映的其實是主流話語對於女性際遇的構想，在現實當中，女性對於個人命運的選擇，往往比歌謠中所吟唱的寬泛得多。

陳永海的〈宗族世界中婦女的勞作與食物〉，考察了客家婦女在20世紀香港新界農業的商業化過程中的角色。學界普遍認為，該地區的農業依賴水稻種植，然而客家婦女飼養具有較高商業價值的生豬，自己則食用商業價值較低的番薯的事實卻挑戰了這個說法。另外，作者還發現，這些婦女與母家的緊密聯繫是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份，這個論點也挑戰了中國的宗族是由父系來構建的見解。

在討論完本土文化與儒學規訓的融合後，本書第二部份轉而關注這個地

區的另一個文化傳統。西方人在殖民地和商業口岸植入了西方的倫理與規則，這些獨立於儒家社會法則之外的因素，為女性提供了別樣的生活機遇，婦女的社會角色也隨之動盪變遷，難以界定。

蔡志祥的〈走出門戶？潮汕移民社群之中的婦女，1850-1950〉，強調了制度對婦女際遇的作用。在潮汕地區，男性到海外謀生，女性則負責管理和決策家庭生計和不動產，並因此獲得了從事商業活動的機遇和資財。但是，潮汕女性未能進入商業社會的公共領域，而仍然受制於儒家道德，其經濟活動也囿於家庭範圍之內。作者認為，只有當制度層面的保障生效，婦女才有走出門戶的機會。這一變化正是在潮州設為口岸，以及為從商婦女提供法律保護的西方傳統傳入之後才開始的。

施其樂（Carl T. Smith）的〈墮入繁華：僑民社會邊緣的婦女〉，講述在多文化交融的地區，女性如何在來自不同文化的規則和倫理之間斡旋，為自己爭取最有利的處境的故事。例如在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某位「蛋家」婦女援引英國法律，取得她身為美國船長的丈夫的遺產，這些在中國文化中處於邊緣位置的「蛋家」婦女，精明地運用了西方殖民者所設立的規章制度，從而使自己得到較好的經濟保障，她們之中更有人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

黃麗娟的〈身為歐亞混血兒的中國婦女：何張靜蓉女士與戰前香港佛教〉，將目光投注於香港富商何東之妻、張靜蓉女士身上。張靜蓉的丈夫何東是一位歐亞混血兒，她本人也有歐亞混血背景。她開設了「東蓮覺苑」，為香港的信佛女子提供前所未有的教育機會，也從而拓展了佛教的社會功能。她的經歷，反映了20世紀早期香港殖民地社會中，生活於儒學規範與英式傳統之間的香港貴婦人的奇特的社會文化空間。

此前的各篇文章，共同展現了近世華南地區的女性如何經歷該地區的歷史變遷。第三部份將時空轉移到自二戰後至今的當代社會，關注香港與華南地區在分隔與重新融合的過程當中，女性的主體性以及她們的社會身份。

蕭鳳霞的〈女強人：性別化的魅力〉，以陳方安生等一代女性高級公務員為例，以說明戰後香港作為本地社會、華南地區的重要地帶，英國殖民地管理的交接點，亞洲金融中心，以及國際都會，是如何為既具魅力又有能力的香港女性提供機遇，從而讓她們營建出屬於自己的舞臺的。20世紀70至90年代，香港的女性高級公務員通過保持中國商業社會的「傳統」，為自己贏來社會聲望，她們的西式教育背景，又讓她們得以在世俗領域取得長足的進展。這些戰後一代的女性取得社會成就，並得到了公眾的認可。

蔡寶瓊的〈20世紀60至90年代的香港女工：聲音、意義和結構性的制約〉，關注戰後的「經濟奇跡」時代的女工，並討論階級和性別的架構如何制約個人的境況與際遇。伴隨着這一時期香港的經濟騰飛，香港女性在年幼時已開始工作。她們把辛勤勞動所得幫補家計，這種行為被認為是「顧家」的好女孩的做法，當時鮮有人質疑這種雙重剝削的合理性。直到經濟奇跡過後，業已步入中年的女工才逐漸體味出既失去青春，亦失去往日在經濟上的驕傲成就的無奈。

嚴麗君等撰寫的〈半邊天：流動性與近期社會主義者的浮影〉，勾勒了與上篇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女性的「鐵娘子」形象。與香港的「女強人」不同，這些在工作上不讓鬚眉的鐵娘子的形象往往缺乏女性特徵。毛澤東時代的婦女平權運動，讓她們得以通過受教育或參軍等方式達成自己的抱負，並在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功。由此可見，即使在政治話語無所不在的時代，女性依然有不同的途徑與大的政治氣候討價還價，而不是被動地附庸於它。因此，女性總是革命的受害者的觀點有待商榷。

Pheng Cheah 的〈陳果電影「榴槤飄飄」所想象的中國特質，以及大陸到港女性的流動〉，從電影入手，講述新自由主義經濟時代下錯綜複雜的女性主體性。電影「榴槤飄飄」講述的是一位大陸女性在香港淪為賣淫女，卻因為她的高收入而在家鄉被當作成功女性的故事。她的身份轉換為她帶來了經濟上的收益，然而她卻無法擺脫這種不道德行為所造成的心靈陰影。作者從這部電影中讀出了多種價值觀彼此牽拉所構建的緊張氛圍，以及它給女性打工者帶來的惶遽、空虛，和終身難忘的痛苦體驗。

綜上所述，通過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所見，此書的作者們用跨學科的方法，關注婦女、商業和華南區域文化。它既從女性史的角度回答了華南區域歷史的一些問題，又回應了性別研究的一些觀點。在華南地區，婦女際遇隨着近世歷史的商業化進程而跌宕浮沉，性別角色也具有紛繁蕪雜的表現形式。該地區曖昧而動盪變遷的性別特徵，反映了男權與女權並不總是固定的、二分式的，性別主體性也從來不是靜止的。

張妍妍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